

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
学术研究史丛书

史学专辑

陈祖武 主编
杨泓

世界史研究

于沛 /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学术研究史丛书

史学专辑

陈祖武 杨泓/主编

世界史研究

● 于沛 /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史研究/于沛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1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ISBN 7—211—05125—6

I. 世... II. 于... III. 世界史—研究 IV. 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5792 号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世界史研究

SHIJIESHI YANJIU

于 沛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编: 350003)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6.75 印张 2 插页 178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211—05125—6/定价: 16.2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于沛，1944年5月生于天津。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历史学硕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校兼职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史学理论研究》、《世界历史》杂志主编。1992年起领取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被评为“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主要从事外国史学理论及俄国史研究工作，近年在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理论、外国史学思想史和斯拉夫文化史等方面，有多种成果问世。

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史学专辑(陈祖武 杨泓 主编)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简牍帛书发现与研究
甲骨学殷商史研究
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
宋史研究
辽西夏金史研究
元史研究
明清史研究
中国近代史研究

世界史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
中国古代陵墓考古研究

文学专辑(傅璇琮 主编)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中国戏剧研究
中国词学研究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西方文学研究
比较文学研究
中国诗学研究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

哲学专辑(楼宇烈 主编)

中国哲学史研究
西方哲学的传入与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与研究
儒学研究
逻辑学的传入与研究
伦理学研究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研究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俞金树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杨 泓 陈祖武 俞金树 傅璇琮 楼宇烈

总策划：傅璇琮 俞金树

策 划：刘亚忠 刘 石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出 版 说 明

20 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19 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 20 世纪开始加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学术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涌现出了众多的学术名家和大批的学术经典，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在这一世纪从学术观念到著述形式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研究、总结 20 世纪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各个学科学术研究百年成就的审视，也是对中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集体回顾，其意义便显得格外重大。

1998 年初，我社与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先生、清华大学教授刘石先生共同筹划编纂一套反映 20 世纪人文学科发展历史的丛书，并定名为《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之后，我们约请到傅璇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祖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泓四位先生担任丛书主编，并由他们规划框架，制订体例，拟定选目，延聘全国各地专家学者承担编写工作。

在诸位学者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福建省新闻出版局的大力支持下，这部涵盖文学、史学、哲学三大系列近 30 册的丛书终得面世。从酝酿到成书的六年间，人类已经跨越了一个世纪，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跨世纪工程”。中国传统学术包容广博，蕴涵深厚，讲究“一致百虑，殊途同归”。20 世纪的中国人文学科，亦充分体现了这一历史特质。唯其如此，这部丛书的选题

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的学术定位是，不仅限于对各学科百年学术研究面貌的勾勒和研究成果的综述，同时也力求结合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变化，从学术思想的起伏演变探索 20 世纪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得失成败。通过历史反思来探寻规律，获取经验，为新世纪人文学科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至于各书的布局和风格，亦不强求体例的划一，旨在充分发挥作者的创造性思维，驰骋其表现才能，以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我们高兴地看到，就在这部丛书面世前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意见》强调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意见》并指出，要扶持对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项目，要在国民教育中加大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比重，不断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

体会《意见》的精神，我们更加感到这部丛书的出版正逢其时。我们希望也相信这部丛书能够为《意见》中所指出的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等做出自己的贡献。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世界史研究	(9)
第一节 20 世纪早期的世界史教育	(9)
第二节 西方史学理论的传播	(13)
第三节 何炳松和鲁滨逊的《新史学》	(17)
第四节 傅斯年和兰克学派	(22)
第五节 西方历史哲学的传入和回响	(28)
第六节 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其他早期成果	(44)
第二章 唯物史观和世界史研究的科学化	(63)
第一节 20 世纪初期对唯物史观的译介	(63)
第二节 十月革命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	(69)
第三节 唯物史观和对世界历史的新认识	(85)
第三章 新中国史学建设中的世界史研究	(96)
第一节 苏联史学和史学理论在中国	(96)
第二节 新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和科学成果	(100)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世界历史学	(113)
第四章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阶段	(127)
第一节 文献资料	(129)
第二节 专题史研究	(131)
第三节 地区史、国别史研究	(137)
第四节 通史	(151)
第五节 译著	(152)



第五章 新时期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	(154)
第一节 外国史学理论研究	(157)
第二节 西方历史哲学	(166)
第三节 西方历史学分支学科	(169)
第四节 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	(174)
第六章 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世界历史研究	(187)
第一节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特点和趋势	(187)
第二节 对策性、前瞻性和全局性研究的加强	(192)
第三节 建立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 ...	(197)
第四节 中外史学交流和中国世界史研究走向世界	(201)
 主要参考文献	 (204)

绪 言

20 世纪中国世界史研究，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说鸦片战争期间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打破中国国门，当时中国对西方文化是一种被迫的接受，那么在 20 世纪更多的则是一种自觉的文化选择，企图借助外来的文化解决中国文化发展或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迫切问题。20 世纪中国世界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中国世界史研究是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研究始终贯穿于中国史学发展的以下四个阶段：始于 20 世纪初的中国“史界革命”和“新史学”；“五四”之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在火热的斗争中锻炼成长；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进一步发展壮大，以及“左倾”思潮影响下，在某些方面出现了简单化、概念化倾向；“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史学拨乱反正，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和汲取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世界。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20 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以进化史观为核心的史学发展的直接成果。20 世纪初，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而它们的出现，首先是和包括史学在内的外国学术思潮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20 世纪初，严复译的《群学肄言》、《天演论》系统阐释了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原理，大力宣扬赫胥黎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

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他认为“史界革命”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以及后来撰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著作中，梁启超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史学开始脱离 2000 余年的封建传统。

五四运动之后，大批在欧美和日本读书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一些人先后将日本史学家坪井九马三、九米邦武、浮田和民，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班兹、塞格利曼，法国史学家朗哥诺瓦、瑟诺博斯等人的代表作译成中文出版。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到 30 年代中期，一些中国学者明确提出向西方史学学习，并用西方史学改造中国史学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明确指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① 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这些作品中文本的出版，对于中国史学界对世界史的认识，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0 世纪初，西方历史哲学思想也陆续传入中国，主要有美国杜威的试验主义，英国罗素的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论，德国杜里舒的活力论、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凯尔特尔的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或文化科学的理论、赫尔德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哲学理论、兰普勒希特的文化史观和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历史观、法国孔德的实证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等。上述历史哲学思想内容庞杂、各有侧重，但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在西方史学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思潮，在中国史学界

^① 朱希祖：《新史学·序》，见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 年。

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 世纪初,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其代表作《西方的没落》(中文本由商务印书馆在 1963 年出版)中提出文化形态史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多卷本《历史研究》中继承并发展了这个理论。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史坛出现了以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战国策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陈铨、何永佶、林同济、雷海宗等。1940 年,林同济、雷海宗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在上海出版,主要内容包括“形态历史观”、“民族主义与 20 世纪”、“战国时代的重演”、“历史的形态与例证”和“历史警觉性的时限”。

“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除李大钊外,蔡和森、李达、瞿秋白和陈望道、李汉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或译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述唯物史观的著作,或撰写文章及专著宣传唯物史观,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哪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即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哪些社会经济形态,或经过了哪些发展阶段。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广大进步的史学工作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提出自己的中国历史分期理论,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

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下两大方面：其一，介绍、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及其研究实践，以其为榜样；坚持唯物史观，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及封建主义传统史学的影响。其二，在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开展了热烈的争鸣和讨论，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国史坛出现了繁荣景象，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同时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曲折。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出版的《历史问题译丛》、《史学译丛》，以发表苏联史学家的史学论著为主，其中不少是关于民族问题、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问题，以及批判欧美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文章。《历史研究》先后编辑出版了《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三联书店，1956年），《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科学出版社，1957年），《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60年）等文集。此外，还有《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尚钺编，三联书店，1955年），《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1957年）等。新中国成立后到6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不仅批判唯心主义与唯心史观，而且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争鸣和讨论，都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是在苏联史学的直接影响下开展的。

1961年，周扬主持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既不要照搬苏联，也不要照搬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建设自己的文科教材的任务。60年代初，以高校文科教材编写会议为契机，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开始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在这期间，开始出版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以及西方

史学（包括史学理论）名著的全译本或选译本，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也开始较深入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不少有影响的成果问世。但是，不少文章的内容明显地印有受“左倾”思潮影响的痕迹，那就是一般性的政治批判代替了具体的学术研究，对西方史学家的思想和西方史学思潮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党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一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形形色色的外国史学思潮介绍到中国来，中国史学也走出国门，彻底结束了“左倾”思想影响下的封闭状况。中国世界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首先，我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在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科学的认识并给予了正确的评价。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是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并产生积极的反响联系在一起的。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经过必要的精心组织，一批有广泛影响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中译本相继出版，为深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我国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从时间上看，包括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直至20世纪末；从空间上看，包括西欧、北美、拉美、苏联、俄罗斯、东欧、非洲和东方的日本、印度等国。从内容上看，则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历史哲学和史学史等。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完全改变了只局限对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

其次，在有关人类历史进程的研究中，学者们克服种种困难，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今天，世界史学科不仅已经建立起一支优秀的科研和教学队伍，而且硕果累累，为世人所瞩目，表明中国世界史研究新的繁荣时期已经到来。

世界上古史研究有一批有影响的学术专著问世，这批专著和相关论文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原始社会史的分期、原始社会组

织的作用及表现形式、原始公有制、社会经济形态、亚细亚生产方式、黑劳士性质、专制主义和古代东西方社会发展道路、古代民主共和制度、古代印度史、古代埃及史、古希腊史、古罗马史、早期基督教的产生及演变、中外古代史比较研究等。

中世纪史研究有了很大的拓展，出版了不少重要的学术专著，它一改以往只重视“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农民战争、王朝更迭、圈地运动等传统课题的状况，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西欧中世纪社会结构、16世纪中英政治制度比较、中世纪农业经济的中西比较研究等。并开始重视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研究，通过对婚姻、家庭、妇女、性等问题的探讨，重新认识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图景，揭示历史矛盾运动的实际内容。由研究内容不断深化所决定，在研究方法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学者们在使用传统的史学方法的同时，重视使用比较方法、计量方法，以及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方法。

世界近代史研究的领域十分广阔，学者们求实创新，在原有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新的研究课题，如美国殖民地时期史、美国近代经济发展史、美国城市史和移民史、中国拉丁美洲关系史、非洲近代通史和近代非洲文化史、近代中东史、日本传统文化与近代化、日本政治体制、英国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近代法国发展模式、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俄国工业化道路、俄国和日本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等。

“文化大革命”前，我国世界史研究的下限，一般都是截止到1945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包括战后内容的世界现代史研究（或称世界现代—当代史研究），则是近20年才开始的。世界现代史研究和当代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现实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研究课题反映了当代世界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殖民体系瓦解的历史必然性，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20世纪人类历史剧变等。

在世界史研究中，通史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世界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有国别史、地区史、断代史、专史，而无通史研究的世界史，是不完整的世界史研究。近年在我国世界史研究迅速发展的推动下，有多种通史性著作先后问世。

过去的 100 年，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在艰难中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并将直接影响到未来的发展方向。首先，在世界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研究方法不断完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世界史的整体性研究将得到较大的发展。其次，改革开放的中国使世界史学科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世界史研究不能回避现实生活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开展世界史基础性研究的同时，将更加重视前瞻性和对策性的研究，努力做到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结合，以充分地发挥历史科学的科学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政治史不再是世界历史研究的中心，当前研究较少或基本上没有涉足的问题，如历史进程中的城市化问题、人口变迁与现代化问题、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问题、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与世界、民族主义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等，将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此外，在社会史、思想史、宗教史、民族史、民俗史、国际关系史、军事史等领域，也会有一些与当代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即使是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研究，也会在新世纪中国历史科学迅速发展的推动下，出现新的变化，由以往强调历史过程的描述向强调理论性的描述转化，同时选题也将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最后，对计算机信息技术在世界史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应给予充分的重视。近 20 年来，以计算机和因特网为重要内容的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不例外。今后学者们在研究方向的选择、确定具体的选题、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处理、国内外学术交流以及成果的发表等等，将进一步使用信息技术。计算机和因特网并不仅仅是世界史科研人员不可或缺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有助